界限与共识

——全球化时代英国穆斯林移民与社会整合问题研究

常 晶

内容提要 : 穆斯林移民问题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尤其是“9·11”事件以后,给英国社会整合带来了新的挑战。过分追求一致性,容易导致对其他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忽视,过分强调多样性,又容易在文化与文化之间竖起重重藩篱,分散的认同和忠诚会给社会带来碎片化和分裂的危险。这样的现实要求国家在处理多族群问题时超越民族国家的思维、超越现代民主制度的局限性,通过确立信任,在合理界限之下取得最大共识;通过多层次的对话协商来寻求理解和共识,通过再分配政策调节来促进社会内部的流动性,通过更具包容性的公民身份和共同体核心价值观来增进认同感和政治忠诚,在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取得平衡,方能实现社会整合、和谐共存。

关键词 : 英国 穆斯林移民 多元文化 界限 共识

作者简介 : 常晶,山西长治学院教师。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传统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概念构成了挑战,越来越广泛的流动性和多样性给同质化的民族国家提出了更多新的问题,原先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解决的问题不得不放在世界视野中考虑,不论人们如何看待全球化这一进程,它在客观上业已影响了世界各国的政治过程。正如格斯所言:“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我们栖身的这个星球的缩小,民族、族群及不同文化集团之间的交往必然地扩大了。与此同时,在国家内部,大规模的新移民社区也改变了城市和国家一度曾经由同宗、同源之人口组成的人口性质。”⁽¹⁾人口迁移与文化多样性问题已经成为许多国家不可忽视的政治议程,尤其是在外来移民的文化与迁移国文化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当文化差异与利益问题交织在一起,不同文化群体如何共存、如何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实现文化融合和社会整合、如何保障政治的稳定和发展,就成为重要的议题。本文拟从英国穆斯林移民群体与主流文化群体的关系入手,分析英国在处理移民与国家整合问题上的政策与做法,并对其困境与走向做一评价。

一、差异与冲突 : 英国穆斯林移民问题的形成与现状

关于英国接受穆斯林移民的历史可以追溯至 19 世纪中叶,由于 1869 年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往来愈加频繁,产生了一大批港口和船舶运输的劳动力需求,也门人成为第一批到达英国的穆斯林移民,开始在加的夫、利物浦、伦敦等港口定居。⁽²⁾一方面移民人数并不多,另一方面他们的工作、居住地点比较集中,与主流社会交往和互动比较少,因此,尽管他们在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等方面与英国主流文化相距甚远,这些差异并未造成社会冲突。

大规模穆斯林移民的到来得益于二战后的逆向殖民潮,战后英国重建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政府施行极为宽松的开放政策,吸引了前英属殖民地国家的大批劳动力移入,这些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孟

(1) [美] 菲利克斯·格斯,王建娥、魏强译:《公民与国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9 页。

(2) 参见 [英] 安塔拉·席迪格,罗强强编译:《英国穆斯林在过去和现在》,《世界宗教文化》,2006 年第 3 期。

加拉国的劳动移民又吸引了他们的亲属友众的移入；随后还有几次比较集中的移民潮，一是20世纪60年代初巴基斯坦玛格拉大坝的修建造成了一部分米诺普诺斯人到英国投奔亲友，二是来自非洲东部国家的亚裔，非洲国家的独立和经济国有化政策使大批持有英国护照的亚裔商人来到英国，三是20世纪60年代穆斯林国家派往英国的留学生，他们在英国的大学里组建了各种伊斯兰社团，其中一部分人最终留在了英国。⁽¹⁾随着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的愈来愈密切频繁，英国穆斯林移民一方面在人数上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他们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穆斯林社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据《卫报》2002年6月统计结果显示，目前英国国内穆斯林移民的总量已达180万人，约占英国总人口的3%⁽²⁾，而调查也显示，穆斯林移民在教育、就业、住房等方面大都处于较低水平，受教育水平低、较多地从事体力劳动行业、低收入也造成了穆斯林群体在整个社会中的边缘化和底层化。

现代社会的生活和交往方式使得任何小团体无法在封闭的范围内自给自足地存在，生活在英国的穆斯林移民势必要与基督教文化的英国社会共处，交往与共处尽管提供了融合的可能，然而在最初，往往带来的是差异与分歧，这些歧异又埋下冲突的隐忧。正如亨廷顿所言：“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³⁾首先，文化差异带来了种种分歧，文化是在长期的日常生活、家庭、亲众关系、习俗中形成的共同纽带，既是一部分人的共同记忆，也代表一定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穆斯林移民在语言和宗教信仰上与英国主流社会是完全不同的，体现在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上，是沟通的困难；体现在作为精神纽带的宗教信仰上，是教义教俗的差异；体现在日常的生活方式上，是服饰装扮的不同，等等。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对同质性的追求以及严格的公民身份界限，也使移民群体不得不面临居住、就业、教育、社会福利和政治参与等方面的种种限制。这些差异使移民群体显得与英国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而英国国内主体民族的反移民声浪也渐强。最初的反对目标不是穆斯林移民，而是黑人。早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民居和商店外随处可见“黑人与狗禁止进入”的牌子，1964年在国会大选中保守党候选人的非官方竞选口号“如果你希望和黑鬼为邻，就投工党一票”也可窥一斑。⁽⁴⁾虽然这些反对的声音并不针对穆斯林移民，相对于黑人而言，穆斯林移民的处境要稍好一些，但由此可见的是，种族差异带来社会内部的细碎分裂已经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来。

当族群认同和宗教认同的差异交织在一起时，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就更大。宗教的教义、教俗、教会组织、宗教场所甚至特殊的服饰装扮，都在一定程度凸显了群体的特殊性，这些相对族群文化的显性和刚性特征也增加了与他人的隔阂，普世性观念主导的宗教认同差异，也使调和变得不那么容易。Jacobson发现，“不论亚洲族群团体在何处崛起，一定可见清真寺、寺庙和圣堂。亚洲移民努力将他们的宗教信仰移植到基督教国家，意谓许多亚洲人较偏向在社会生活中延续本身信仰的宗教，而非努力适应新文化”⁽⁵⁾，因此，在差异确实存在、又没有相应协调举措的情况下，冲突的可能就仍然存在。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冲突的可能性也会增大，有时一些不起眼的事件也会成为冲突的诱因。20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穆斯林移民群体与主流社会在价值观和身份认同上的歧异交织着国际政治问题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拉什迪与《撒旦诗篇》事件就反映了穆斯林群体与主流社会的紧张关系以及穆斯林族群身份与英国公民身份之间的张力：其一，在《撒旦诗篇》出版之初，并未引起穆斯林的激烈行为，相

(1) 参见[英]安塔拉·席迪格，罗强强编译：《英国穆斯林的去和现在》，《世界宗教文化》，2006年第3期。

(2) 来源：英国穆斯林委员会(MCB)官方网站<http://www.mcb.org.uk/library/statistics.php#1>。

(3)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36页。

(4) 参见Peter Kivisto著，陈宗胜、连咏心译：《多元文化主义与全球社会》，台北：韦伯国际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187-189页。

(5) 同上，第197页。

反，他们以冷静而克制的态度试图通过正常渠道的沟通来取得双方的谅解，即与事件相关方以及议员沟通，要求增加声明“故事纯属虚构”的插页，至多以一些示威行动作为配合，但是主流社会并没有表现出积极而对等地沟通态度，这种漠视在一定意义上减损了穆斯林群体对社会的信赖。其二，在没有得到社会响应和重视的情况下，穆斯林开始进行街头焚书，这种激烈的行为刺激了传媒和主流人士，穆斯林因此被称为狂人分子、野蛮人。这种不分就里的指责更伤害了穆斯林的感情，事实也反映了少数族群文化在主流文化面前的卑微地位。其三，当拉什迪事件演绎成为全球性事件后，穆斯林群体在英国遭受了强烈地批评，著名小说家安东尼·伯吉斯在《独立报》上撰文将焚书事件与纳粹焚书相提并论，《卫报》社论也提出“他们既然生活在现代世俗社会，就应当改变原有思维和生活方式”⁽¹⁾，这些批评充分反映出主流文化与少数群体文化之间的张力、现代公民身份对国家的认同与少数群体对族群身份认同之间的张力。

“9·11”事件以后，尽管英国国内的穆斯林群体表示了坚定地反恐怖主义立场，无可避免的是，英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还是患上了“伊斯兰恐惧症”，恰如亨廷顿指出的那样：“他们的立法接受了可以讲完美法语的黑非洲人，但是他们不能接受在校园里蒙着头盖的穆斯林姑娘”⁽²⁾，2005年7月初的伦敦爆炸案、2007年7月初的伦敦和格拉斯哥机场汽车炸弹事件等恐怖活动，使得英国社会对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的憎恶与恐惧很自然地转嫁到了国内的穆斯林群体身上，偏见加深了紧张关系。值得深思的是，2005年7月7日伦敦地铁爆炸案中的四名恐怖分子都是在英国本土出生、完全生活在当地社会的穆斯林青年。2006年8月因涉嫌企图制造一系列爆炸案而被捕的23名嫌疑人当中，也多半是没有犯罪前科的年轻人，所在的行业包括医学专业的大学生、小企业老板和快餐外卖送货员。这不仅使人们重新审视自二战后至今英国的移民和种族关系政策，也引发人们对处理多数族群与少数族群的关系进行再思考。

而站在穆斯林群体的立场，海湾战争、波黑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也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是谁？”，摆在了他们面前，是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还是英国的公民？尤其是移民的第二代年轻人们，面临着多重身份和多重认同调和的复杂过程。一方面在时间上拥有伊斯兰的记忆和传统，另一方面在空间上生活于英国社会；一方面他们也希望拥有平等的公民身份，另一方面又希望保留族群文化的独特性；一方面他们试图融入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来自主流社会的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另外，就业和社会福利以及政治参与等问题，给国家整合增添了更复杂的因素。

二、排斥、同化还是多元文化主义：英国移民政策评价

全球化时代强化了人口的流动性和群体的多样性，移民群体的存在构成了多元文化的现实，这是不能否认也无法改变的。对于以同质性建构为基点的民族国家而言，这无疑是巨大的挑战，民族国家在对待多元文化问题上，存在不同的态度和策略，大致有排斥、同化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等主要的方式，而具体到每一种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程度的区别：1. 排斥，这种方式主要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移民政策来禁止或限制移民的迁入，并在公民身份上进行严格的规定，而主流社会也对移民群体采取孤立、拒绝、轻视甚至敌对等态度，种族清洗可以归在这一方式中最严重的维度；2. 同化，与前一种方式相比，政府的移民政策比较宽松，也对移民群体的权利有所保护，但是同样存在严格的公民身份规定，移民要想取得公民身份，在语言、对国家的认同等方面都必须达到一定的要求，主流群体尽管较少地表现出排斥态度，能够给予移民群体一定的尊重，但仍然缺乏足够的重视；

(1) 阮炜：《拉什迪世界与“文明的冲突”》，《回族研究》，2004年第4期。

(2)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20页。

3. 多元文化主义, Multiculturalism 这一语词最早出现于霍拉斯·卡伦 1915 年发表的《民主与熔炉》一文中⁽¹⁾, 不同派别的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各有侧重, 各国施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也没有统一形式, 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 政策的重点也有不同, 基本的共同点是对差异的尊重和包容, 对少数族群权利的重视和保护, 但是从根本上讲还是为了民族国家的整合,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背后往往隐藏着柔性同化的目的和对整体一致性的追求。在处理移民问题的时候, 英国的政策也并非一以贯之。

在移民问题上最初的开放态度, 是源于对劳动力的需要。1948 年的英国国籍法规定, 英联邦居民都是英国的公民, 这事实上对英联邦居民迁入英国定居是一种鼓励。然则, 张开怀抱接纳劳动力, 并不代表在处理文化群体关系上做好了准备, 劳动性移民的文化属性在一开始也并没有被充分地考虑到。另一方面,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的这部分劳动性移民多为年轻人, 通常没有技能、也不识字, 主要目的也以赚钱积累财富为主, 他们以临时劳工和寄居者自居, 并没有代代定居下来的打算⁽²⁾, 因此, 由于输入移民本身的性质以及数量和交往的有限性, 对如何共存的忽视也就显得不是那么紧迫了。

随着移民人数的增长及其构成的复杂化, 来自于原英属殖民地的新移民在肤色、语言、宗教信仰等方面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 他们形成了拥有较为牢固纽带的群体, 由于政府在起初的时候并没有配套的政策, 于是就带来了住房、就业、教育、福利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主流社会也因此对他们充满了敌意。这时候英国政府政策转向和主流社会的态度就反映了“一致性帝国”⁽³⁾对异质性的拒斥。英国政府在 1962 年、1968 年、1971 年和 1972 年接连推出移民法案, 限制移民进入, 1981 年的国籍法对公民身份提出了严格的规定, 这些法案充满了种族歧视的意味, 其目的事实上不是要限制希望成为英国人的移民, 而主要针对那些希望取得英国国籍的黑人。⁽⁴⁾已经在英国国内定居的移民处境相对好一些, 为了协调存在种种藩篱的族群关系, 英国政府于 1965 年、1968 年和 1976 年相继推出种族关系法案, 指出, 在公众生活领域以及住房、就业和教育领域的直接和间接歧视都是违法的。⁽⁵⁾严格的移民法和相对宽松的种族关系政策相互配合,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英国国内的族群关系; 同时, 政府还成立了种族平等委员会, 专门仲裁和协调种族冲突问题、推进种族平等计划。20 世纪 90 年代, 地方的社区关系协调委员会被种族平等委员会所逐步取代, 地方社区组织也为政府与移民聚居社区之间提供联系和互动的渠道。对多样性的尊重和宽容为英国制定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埋下了伏笔, 这些政策和举措在那个时候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宽松的社会环境中, 英国穆斯林移民建立起自己的社团、获得了教育机会、可以按照自己的宗教习惯在英国社会中生活等等。

尽管早在 1966 年, 英国内政大臣就确认了文化的多样性⁽⁶⁾, 但英国的多元文化政策系统地推行应该是到了 1997 年的工党政府时期。最显著的是, 英国穆斯林委员会 (Muslim Council of Britain) 在工党政府支持下于 1997 年成立, 作为英国穆斯林群体的全国性组织, 可以在政府和穆斯林群体之间建立一个可以沟通并形成共识的平台。另外, 工党政府在教育方面为穆斯林群体提供了很大的包容和支持, 比如, 批准了被保守党政府两度拒绝的将穆斯林小学纳入公办体制的要求。紧接着在 2000 年和 2003 年

(1) 常士闯:《异中求和——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2) 参见 Peter Kivisto 著,陈宗胜、连咏心译:《多元文化主义与全球社会》,台北:韦伯国际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187页。

(3) 詹姆斯·塔利的《陌生的多样性:歧异时代的宪政主义》一书中出现代宪政打造了一个“一致性帝国”,以文化的同质性、单一的国族认同等为基本特征。参见[加]詹姆斯·塔利著、黄俊龙译:《陌生的多样性:歧异时代的宪政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3-71页。

(4) 参见比尔·考克瑟等著,孔新峰等译:《当代英国政治》(第四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98页。

(5) 同上,第599页。

(6) Christian Joppke: *Immigra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and the Great Britain*, New York:Oxford, 1999, p.223. 转引自洪霞:《种族冲突·文化界限——战后英国的多元文化政策》,《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分别推出了《种族关系修正法案》和《就业平等（宗教或信仰）法案》，扩大了对少数族群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在这样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之下，穆斯林族群与英国主流社会相处的比较融洽。Peter Kivisto 评价说：“此模式的主要核心不在使移民差异性完全消失而同化为‘英国人’，而是使社会成为多元文化社会，在此社会中以尊重的态度来欣赏并宽容各种差异性⁽¹⁾。好景不长的是，“9·11”事件以及之后接二连三在英国国内发生的恐怖活动，让这种渐进形成的多元文化政策饱受争议。比如在2004年，一些民间的中央左派及自由左派论坛和协会举办了讨论会，出版了以诸如“多元文化主义死了吗？”“多元文化主义结束了吗？”“超越多元文化主义”等等为标题的出版物。众口一致的评论都声称多元文化主义已被伦敦爆炸案所杀死，因此当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被贴上“撤退”标签成为司空见惯也就不是是一件可令人惊讶的事情了。

针对英国长期以来逐渐形成并推行的尊重文化多样性、创造新的多元文化社会的政策，争议的焦点主要是，多元文化政策究竟是增进了多种文化的共存还是造成了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对多元文化政策的质疑有其理由：一方面，多元文化的存在破坏了英国社会的同质性，尽管对文化的多样性显示足够的包容，但是关于在一个多族群的多元文化社会里如何重新认识英国公民身份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布莱尔提出的“英国性”也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与之相关就带来很多问题，何谓英国人？如何成为英国公民？共享的价值观是什么？需要人们怎么做？政府又能提供什么？等等。种种恐怖活动发生以后，英国影子内阁内政大臣多米尼克·格里夫曾表示，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实际上创造了一种真空状态，他承认多元文化主义事实上是想创造一个柔性同化的大熔炉，但在实践中却因为没有树立起英国的共同价值观，而人们对自己身份的文化绝望。⁽²⁾另一方面，在对文化多样性的包容之后，没有相应的其他政策辅助，就使得这种包容流于形式，正如沃里克大学社会学家达妮·埃尔乔利指出的，这种模式指望靠文化和建造清真寺来解决一切问题，对其他方面不给予足够的重视，例如建立和保障足够的社会流动等⁽³⁾，这样就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族群融入主流社会的问题。Christian Joppke 有一段描述客观而清醒地反映这种情况：“政府制定许多法律条款来表达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态度。例如特准印度教和回教徒不必遵照英国对婚姻的严格限制。……在伦敦东区的布里克巷或南厅的南路上行走，仿佛走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巴马德或印度的旁遮普，介绍充满穿着传统服饰的回教徒、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男女老小，路上可见清真寺，闻到异国香味，听到商店和茶屋传来东方乐曲。在这幅景象中，我们看不到这些拥有英国护照的移民族群想成为‘英国人’的蛛丝马迹”⁽⁴⁾，由此可见，这幅多元文化的五彩拼图似乎缺少一个应有的主题。这充分反映了一致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张力：追求一致性，容易导致对其他文化尤其是少数族群文化的忽视，在“一”的统摄下，多数族群的意志和追求占上风，少数族群的权利和要求要么被无情的忽视了，要么就不得不等待同情与施舍；而对多样性的强调，又容易在文化与文化之间竖起重重藩篱，分散的认同和忠诚会给社会带来碎片化和分裂的危险。另外，对英国多元文化政策提出的种种质疑也显示出，移民和少数族群问题并不仅仅是几个种族关系法案和几项倾向性政策就可以解决的，也不是简单地为不同文化提供存在的空间即可的，移民问题背后所牵扯的对公民身份的要求、对分配正义的要求、对政治参与的要求等等，都持久地构成政治的重要议程。

-
- (1) Peter Kivisto 著，陈宗胜、连咏心译：《多元文化主义与全球社会》，台北：韦伯国际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01页。
 - (2) 英国《卫报》文章：《多元理想给英国带来“可怕”后果》。来源：《参考消息》。
 - (3) 法国《解放报》文章：《英国式多元文化受到质疑》。来源：《参考消息》。
 - (4) 转引自：Peter Kivisto 著，陈宗胜、连咏心译：《多元文化主义与全球社会》，台北：韦伯国际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01页。

三、界限与共识 :在多样性和统一性之间寻求平衡

全球化是交往不断扩大的过程,无疑,这一过程穿越了国界,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普遍联系,人们可以在世界的各个地区共同享用人类文明的成果,但这并不代表这一过程导向的是“一致性之全球帝国”,可能恰恰相反的是,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文化的差异和多样性,并对民族国家和民主制度不断提出挑战。

多元文化问题在英国的存在已经成为无可回避的现实,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言,“英国主流社会种族文化的同质性已经被不间断的、经常是非法的、一浪高过一浪的被迫的或者被动的所谓自由移民搞得五花八门。……移民只是使英国社会众繁复杂多变的许多因素中的一个,它干扰和破坏了英国历史上许多的殖民地,并瓦解了所谓的文化同质性。”⁽¹⁾ 尽管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 20 世纪后期相继成为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德国等国家奉行的处理国内族际关系的官方政策,然而,21 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发生在英国的数起恐怖活动似乎已经宣告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终结,在布莱尔的第二个任期里,更多的提倡英国共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强调融合的责任;布朗上台之后更是直言不讳地指责多元文化主义过分强调多样性,牺牲了团结。现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在 2007 年就表示过,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道藩篱分裂了英国社会。⁽²⁾ 无独有偶,前不久,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波茨坦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她表示希望打破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在德国和当地人和谐共处的隔阂,但是这个努力彻底失败了,这被认为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讲话,民调显示,三分之一的德国人希望定居德国的外国人回国,认为他们除了用欺骗方式获得更多的移民福利,什么好处也不能为德国带来。⁽³⁾ 这些充分说明,处理少数族群问题的复杂性,建立在差异和分歧基础上的关系充满了变数和捉摸不定的可能性。

文化的界限是现实存在的,形成共识的可能性也是广泛存在的。文化多样性与强调统一性与同质性的民族国家和现代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张力。其一,从认同上讲,是包容与同化、排斥与拒绝之间的张力。民族国家和现代民主制度是建立在文化同质性社会基础之上的,并且要求对共同体坚定与自愿的认同。尽管民主为容忍、争论、协调、包容差异提供了基础,但其背后是一致性的框架,在实践上包容往往演绎为同化甚至排斥;相应的,由不同语言、宗教、历史传统、生活习惯等带来的在认同上的分歧、政治共识的缺乏以及分散的政治忠诚,使民主政治中的多元文化成为歧异和混乱的来源。其二,从参与上讲,是语言和文化差异带来的沟通困境。一方面,民主要求广泛的政治参与,然而,语言差异和分裂的亚文化限制了表达和沟通,在英国,一些少数群体可能很难自如地使用英语自由地参与政治讨论与决策,而在交流中也可能因为文化、宗教信仰、价值观的不同而带来误解,另外,公民身份限制也排斥了一些群体的参与。其三,从程序上讲,是多数原则和保护少数权利的失衡。民主政治是多数人的统治,在多数决的原则下,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少数族群、移民群体以及其他非主流文化群体很难获得民主所要求的多数,民主的多数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少数的权利,竞争性的机制也给少数群体的有效参与带来困难,因此在政治实践中,少数群体往往只能被动地接受多数人同意的规则、政策甚至生活方式。但是在现代社会,尤其是 20 世纪 50 年代逆殖民化以及全球化移民潮以来,任何国家试图退守一个完全同质化的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看到文化之间清晰的界限之时,也应该看到,多元文化社会需要一个共同的框架和一些准则来处理如何共存的问题。以英国穆斯林移民为例,他们也在不断试图融入英国社会,通过种族平等委员会、英国穆斯林委员会等制度内机构来表达要求、争取权利。英国穆斯林问题专家 Tariq Modood 于 2010 年 10 月 6 日最近在《卫报》专栏发表的《多元

(1) 斯图亚特·霍尔 :《多元文化问题的三个层面与内在张力》,李庆本译,《江西社会科学》,2007 年第 3 期。

(2) Nasar Meer and Tariq Modood: The Multicultural state we are in, *Political studies*, 2009, vol57, pp.473-497.

(3) 英国《每日邮报》文章。来源 :http://news.china.com.cn/rollnews/2010-10/18/content_4788765.htm.

文化主义并未在英国死亡》一文显示了他对多元文化主义仍然抱有很大的希望，他认为，作为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一种政治平衡，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至少表现了一种政府与穆斯林团体进行集体协商的态度，也初步构建了一个可以对话的平台；而最近强调的凝聚力和公民权应是对英国多元文化主义必要的补充和重组。⁽¹⁾

从英国在处理穆斯林移民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可以看出，在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需要必要的平衡，这种平衡是共识的基础。德里达提出的“延异”(difference)这个概念可以给出很大启发，撇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绝对相同的东西和绝对不同的东西之间，并没有一个二者必居其一的形式，它是‘相似性与差异性的交织，拒绝分离地进入固定的二元中的另一方’”。⁽²⁾也就是说，在社会整合问题上，既需要一个共同同意的框架和原则来协调各种差异、分歧及其带来的利益冲突，同时也需要认识到，这一框架的形成不能基于既有的同质性体系，如果这一框架产生于简单的多数同意，那么这样的共识只是某个主体群体的共识，带有明显的主体民族中心主义和同化色彩。罗尔斯讲的重叠共识需要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也恰恰说明了共识并不是停留在宪法和民主程序上的简单意义的共识，而是“必须建立在一种政治的正义原则之基础上，该政治的正义原则适用于公平正义所阐释的那种社会理念和个人理念……则超出了那些将民主程序制度化的政治原则，进一步包括那些涵盖着作为整体之基本结构的原则。因此，它的原则也确立了某些诸如良心自由、思想自由以及机会均等和包括某些根本需要的原则的实质性权利”。⁽³⁾只有在广泛的交往和互动关系中形成深刻的相互理解、尊重和信任，才有可能在最大程度达成共识。在英国主流社会与穆斯林群体之间发生的种种问题，都证明了没有深刻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是不能够毫无忧虑共存的。孔子在两千年前就得出一个结论：民无信不立⁽⁴⁾，瑞士学者托马斯·弗雷纳在《面临多样性》一文中借用了孔子的话来说明了族群之间信任的重要性：“国无信则不存。当面临现代多样性挑战时，我们必须意识到信任不可或缺。国家不仅需要人民信任它的制度和领导，各共同体之间还需彼此信任。因而，制度必须满足对于所有共同体而言的合法性要求，建立一套使不同民族共同体相互信任的程序。只有在根本的信任之上，多样性才可能在多民族国家成立。”⁽⁵⁾

四、余论

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平衡来源于共识，共识来源于最基本的信任。这种信任一方面体现了通过交往互动（而不是强制同化）带来的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要求国家在处理多族群问题时超越民族国家的思维、超越现代民主制度的局限性，以更广阔的视野、更富远见地创造来摆脱界限的隔离与束缚。要建立起持久而牢固的信任，其一要通过多层次的对话协商来寻求理解和共识，其二可以通过再分配政策调节来促进社会内部的流动性，其三可以通过更具包容性的公民身份和共同体核心价值观来增进认同感和政治忠诚。总之，通过确立信任，进行制度创新，在合理界限之下取得最大共识，在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取得平衡，方能实现社会整合、和谐共存。

（责任编辑 杜 澄）

(1) <http://www.guardian.co.uk/society/joepublic/2010/oct/06/multiculturalism-thriving-uk-muslim-groups>.

(2) 斯图亚特·霍尔：《多元文化问题的三个层面与内在张力》，李庆本译，《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3)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75页。

(4) 《论语·颜渊第十二》。

(5) 托马斯·弗雷纳：《面临多样性》，《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2年第1期。